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研究*

吴方卫 康姣姣

【摘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变化不仅对区域劳动力供需平衡产生影响,也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优化。文章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再外出的流动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利用2013和2018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反复流动的现象,外出的原因主要为增加收入,回流的原因主要为照顾老人及子女等非经济因素,流出地与流入地在政治、社会及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差异促使回到流出地的劳动力心理成本不降反增而再外出,再外出的原因还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相对低稳定性有关。厘清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的机制和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保持区域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相关政策。

【关键词】中国农村 劳动力外出 劳动力回流 再外出

【作者】吴方卫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授;康姣姣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1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非稳态流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流出、回流、再外出的频度提高,流动的地理半径缩短。据统计,2018年跨省农民工占比由2009年的51.25%下降至44%,而省内流动农民工则由48.8%提高到56%。农民工流动特征的变化不仅对区域劳动力供需平衡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将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的优化。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这一短板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单纯依靠农业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如何保持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稳步提高工资性收入及其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措施之一。研究农村劳动力非稳态流动,分析其回流与再外出的动因,对制定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和平衡区域劳动力供需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劳动禀赋时空异质性变化下我国种植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编号:71873082)的阶段性成果。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现象愈加明显,并且流动模式呈多元化。只有少数农民工一开始就能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更多农民工往往频繁地变换工作岗位(王超恩等,2013),或者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循环、往复流动(王子成、赵忠,2013;杨志明,2017)。事实上,劳动力往复流动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Massey(1987)及后续研究(Durand等,2019)发现,在美国务工的墨西哥劳动力也存在类似回流的现象,Ward(2016)对欧洲移民的研究也发现同样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外出主要是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多、收入较高(Gabszewicz等,2016;杨振宇、张程,2017)。另外,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作物劳动需求的下降也促使农业劳动力流出(Bhandari等,2016;Emerick,2018)。而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使转移劳动力在流入地就业的收支余额与返乡从事农业经营的净收入的差距缩小,从而促进劳动力回流(周传豹等,2016;吴方卫、康姣姣,2019)。农村劳动力外出,从熟悉的生活环境转移到陌生的生活环境,因语言、生活习惯及习俗的改变而形成心理成本(Boski,2013;Su等,2018),这些心理成本使劳动力更愿意回到流出地(佐藤宏、李实,2008)。流出地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善(Olesen,2010)也会促进劳动力回流,流动的原因也趋于多元化(段成荣等,2019)。

现有文献主要集中讨论劳动力的初次流动,关于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研究多为对回流现象的观察,缺少针对农村劳动力反复流动原因的探讨,并未考虑在不同流动经历中劳动力流动动因的异同。显然,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与首次流动存在一定的差异(常进雄、赵海涛,2015)。为什么已经外出的劳动力会回流,回流的劳动力又会再外出?为了对农村劳动力非稳态流动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针对这种劳动力流动现象进行理论机制探讨,然后利用2013和2018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揭示不同时期劳动力流动动因的异同。

二、理论分析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可以发现比较典型的“推—拉”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乡劳动力几乎不存在流动,农村大约存在1亿~2亿剩余劳动力(郭犹焕,1995;王红玲,1998)。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纯收入为133.6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在2.57:1左右。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成为拉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力量,同时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农村低收入水平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区域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区域间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也逐步趋向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也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和效益得到较大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入地生存成本也大幅度提高,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就业的收支余额与返乡从事农业经营的净收入或本地就业收益的差距缩小(周传豹等,2016),

这样又“推动”部分外出劳动力回流至农村。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结婚、与配偶团聚等问题则成为“拉动”部分劳动力回流的非经济因素。然而,回到农村的劳动力由于熟悉了流入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对家乡现有的社会、政治及环境生态产生了不适应感,从而推动回流劳动力再外出。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现在部分外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收支余额与返乡从事农业经营的净收入差距缩小,但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仍然较大,收入的稳定性较低,这也成为回流农村劳动力再次外出的拉力。

事实上,劳动力流动是在其比较流出地和流入地效用大小的结果,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经济因素。假定存在 A(流出地)、B(流入地)两地区,G 表示吸引劳动力留下的非经济因素,S 表示促进劳动力离开的非经济因素。流出地和流入地非经济因素包括吸引劳动力留在流出地的因素(如照顾老人及子女、与家人团聚等),促进劳动力离开流出地的因素(如家乡的隐形约束);吸引劳动力留在流入地的因素(如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或者较高教育水平等),促进劳动力离开流入地的因素(如身体疾病、退休等)。非经济因素也可理解为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心理成本,大小为 $\varphi(S-G)$, w_j^i 为农村劳动力 j 在 i 地区获得的工资收入,因而 i 地区代表性消费者 j 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为:

$$\begin{aligned} U_j^i &= (X_j^i)^{\theta} (G_j^i - S_j^i)^{1-\theta} \\ st: p_{xj}^i X_j^i + p_c^i G_j^i + p_s^i S_j^i &= w_j^i, \quad i=A, B \end{aligned} \quad (1)$$

考虑到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个人感受不同,两地非经济因素与公共基础设施、个人情感等有关,并且相对固定,即: $T_j^i = p_g^i G_j^i + p_s^i S_j^i$, 在流出地和流入地效用为:

$$U_j^A = \left(\frac{w_j^A - T_j^A}{p_{xj}^A} \right)^{\theta} (G_j^A - S_j^A)^{1-\theta}, \quad U_j^B = \left(\frac{w_j^B - T_j^B}{p_{xj}^B} \right)^{\theta} (G_j^B - S_j^B)^{1-\theta} \quad (2)$$

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流动,是在比较两地相对效用后选择的结果。那么,劳动力由流出地转移到流入地的效用 V^{AB} 和由流入地转移到流出地变化 V^{BA} 为:

$$V^{AB} = \frac{(p_{xj}^B)^{\theta} (w_j^A - T_j^A)^{\theta} (G_j^A - S_j^A)^{1-\theta}}{(p_{xj}^A)^{\theta} (w_j^B - T_j^B)^{\theta} (G_j^B - S_j^B)^{1-\theta}}, \quad V^{BA} = \frac{(p_{xj}^A)^{\theta} (w_j^B - T_j^B)^{\theta} (G_j^B - S_j^B)^{1-\theta}}{(p_{xj}^B)^{\theta} (w_j^A - T_j^A)^{\theta} (G_j^A - S_j^A)^{1-\theta}} \quad (3)$$

劳动力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转移或反复流动,不仅是两地区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两地区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由于本文讨论的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当劳动力在流出地就业时,大部分劳动力并不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经营,形成既务农又务工的兼业状态,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也构成影响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经济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计

根据理论部分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探讨,劳动力流动与流出地、流入地的经济和

非经济因素相关,当然,劳动力流动也是个体和家庭因素影响的决策;同时,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回流后再外出,以及劳动力回流决策为0-1变量,因此,本文使用logit模型,具体计量模型设定为:

$$P(Y_{ji}=1|R,x,A)=\beta_0+\beta_{1i}\ln R1_i+\beta_{2i}\ln R2_i+\beta_{3i}\ln R3_i+\sum\gamma_{mi}x_{mi}+\beta_{4i}A1_i+\beta_{5i}A2_i+\varepsilon_i \quad (4)$$

其中, $j=1,2,3$; Y_{1i} 表示劳动力首次外出, Y_{2i} 表示回流劳动力再外出, Y_{3i} 表示外出劳动力回流,下标 i 表示劳动个体; $R1_i$ 为外出收入, $R2_i$ 为预期本地收入, $R3_i$ 为务农收入, x_{mi} 为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等; $A1_i$ 为关于劳动者个人禀赋的控制变量, $A2_i$ 为关于劳动者家庭因素的控制变量, β 、 γ 为待估系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首次外出、回流劳动力再外出^①和外出劳动力回流。(1)劳动力首次外出,由于流出地(子女上学、照顾老人及子女、年纪大、身体原因、务农、本地就业)或流入地(担心在外找不到工作)等原因一直留在家乡的劳动力,考虑是否外出。(2)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由于流出地(务农收入增加、家乡就业机会增加、照顾老人及子女、与配偶团聚、回乡有医疗保障、身体疾病、结婚、盖房等)或流入地(工作原因、读书、退休)等原因已经回流的劳动力,考虑是否外出。(3)外出劳动力回流,由于流出地(在家无事可做)或流入地(增加收入、创业、想留在城市、子女教育)等原因已经外出的劳动力,考虑是否回流。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外出收入、本地预期收入、务农收入等经济因素,以及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等非经济因素。具体变量设定为:外出收入为最近一次外出得到的月收入取对数;预期本地收入为预期在家乡非农就业所得到的平均月收入、务农收入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取对数^②。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中,政治生态用政府处理污染的态度(没有处理污染 =1, 处理过污染但效果不大 =2, 很负责任 =3)和村委会财务收支合理程度(不合理 =1, 基本合理 =2, 非常合理 =3)衡量;社会生态用村规(有村规 =1, 无村规 =0)衡量;环境生态用环境污染程度(无污染 =1, 有些污染 =2, 一般污染 =3, 严重污染 =4)。

3. 控制变量

农村劳动力流动除了与流出地、流入地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有关,还与个体禀赋、家庭因素相关,因而本文控制的个人禀赋包括: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具体而言,性别(男性 =1, 女性 =0);受教育水平(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为与同龄人

^① 本文中回流劳动力为在家乡半年以上;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间隔时间也为半年以上。

^② 由于有的家庭没有务农收入,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净资产可能为 0, 金融资产可能为 0, 本文采取加 1 取对数的方式。

相比其身体健康程度(不好=1、一般=2、好=3、非常好=4);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家庭因素包括承包耕地(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净值取对数)、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取对数)、劳动力禀赋(家庭劳动年龄人数)。

(三) 数据与变量统计描述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财经大学2013和2018年进行的“千村调查”。该调查自2008年以来已经进行了12年,2013和2018年调研的方法与历次“千村调查”的方法一致,采取定点调研与返乡调研两种方式。其中定点调研的方式与流程为:30多位带队老师带领300多名学生组成调查团队,在全国22个省份定点调研30个县,从每个县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2个乡镇,再从入选的每个乡镇中分别抽取10个行政村,最后从入选的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15户进行调研。返乡调研是通过大学生暑假返回村落的机会要求学生完成调研活动,每位返乡的学生完成1~2个村的调研活动。调查对象依据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法而确定。本文根据2013和2018年数据筛选劳动年龄(15~64岁)包括没有外出经历的未外出劳动力样本(样本量为42 000)、外出劳动力样本(样本量为10 700)、回流劳动力样本(样本量为3 687)。

2. 变量统计描述

从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看,没有外出经历样本中劳动力外出(即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占比为29%;回流劳动力样本中继续外出的比例为41%;外出劳动力样本中回流的比例为36%。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概率比劳动力首次外出的概率更大,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倾向更明显。大部分外出劳动力会选择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和回流劳动力再外出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普遍现象。

(四) 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 影响劳动力首次外出与再外出的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驱动劳动力外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由于希望增加收入而首次外出的劳动力占比为82.06%,再外出的劳动力占比为85.8%(见表2)。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仍然较大,与进城打工相比,农业劳动收入的稳定性较低,这就推动劳动力外出和回流劳动力再外出。流入地的原因还包括吸引劳动力创业,创业作为首次外出和再外出的原因占比分别为1.8%和1.22%,说明这不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流,回流劳动力更清楚外出创业的风险与困难,因此,为创业而再外出的概率相对较低。流入地的生活相对更便利和基础设施更健全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外出,7.46%首次外出的劳动力和2.37%再外出的劳动力选择了这一原因。还有部分劳动力,由于流出地就业机会较少,在家无事可做,从而选择外出就业,首次外出和再外出劳动力因为在家无事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未外出劳动样本			外出劳动力样本			回流劳动力样本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误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外出	0.29	0.46	42000				0.41	0.49	3687
回流				0.36	0.48	10700			
ln 外出收入	8.06	0.82	6372	8.01	0.66	9367	7.77	0.75	3159
ln 预期本地收入	7.26	0.87	38800	7.46	0.95	10200	7.32	0.90	3631
ln 务农收入	4.16	4.24	42000	3.62	4.15	10700	4.20	4.16	3687
村规	0.92	0.28	42000	0.92	0.27	10700	0.94	0.24	3687
环境污染程度	2.00	0.93	42000	1.89	0.91	10700	2.49	0.84	3687
政府治理污染态度	1.78	0.59	42000	1.78	0.57	10700	1.60	0.65	3687
村委会财务合理程度	1.55	0.69	42000	1.48	0.66	10700	1.45	0.64	3687
性别	0.52	0.50	42000	0.64	0.48	10700	0.64	0.48	3687
年龄	40.60	13.76	42000	37.62	11.04	10700	39.50	11.64	3687
婚姻状况	0.67	0.47	42000	0.70	0.46	10700	0.75	0.43	3687
人力资本	8.34	4.44	42000	8.91	4.10	10700	7.85	4.02	3687
健康状况	3.09	0.89	42000	3.18	0.80	10700	3.08	0.87	3687
ln 家庭固定资产	3.08	4.49	41100	2.92	4.36	10500	3.35	4.41	3558
ln 金融资产	2.95	4.77	42000	3.01	4.77	10700	2.80	4.57	3687
承包耕地	6.04	32.93	42000	4.97	19.77	10700	5.49	24.94	3687
劳动力禀赋	3.39	1.26	42000	3.31	1.26	10700	3.27	1.31	3687

注:根据 2013、2018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整理。

表2 劳动力首次外出与再外出的原因

原 因	首次外出(%)	观察值	回流再外出(%)	观察值
流出地				
在家无事可做	3.77	206	3.20	50
流入地				
增加收入	82.06	4479	85.80	1341
创业	1.80	98	1.22	19
想留在城市	7.46	407	2.37	37
子女教育	2.24	122	1.41	22
其他	2.67	146	6.01	94
总计	100.00	5458	100.00	1563

可做而外出的比例分别为 3.77% 和 3.2%。回流劳动力与一直留在家乡的劳动力相比,具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找到工作的概率相对更大,回到流出地无事可做的概率也较小,因而在家无事可做作为其外出原因的比例相

对较低。

2. 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流出地的非经济因素在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影响最大,占比为 56% 以上,其中,回家照顾老人及子女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原因(见表 3),占比达到 33.11%。由于农村劳动力更愿意生活在固有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在家乡还有老人及子女等需要照

表 3 劳动力回流、外出与留守原因

原 因	回流	观察值	原 因	未外出留守	观察值	回流后留守	%
流出地							
务工收入增加	3.55	131	照顾老人及子女	20.41	9090	16.47	775
家乡机会增加	6.37	235	上学	5.37	2390	1.13	53
照顾老人及子女	33.11	1221	年纪大	27.05	12049	10.65	501
配偶团聚	5.53	204	身体原因	5.23	2331	3.12	147
身体疾病	4.91	181	务农	2.11	939	1.00	47
回乡有医疗保障	1.27	47	本地就业	11.32	5040	5.31	250
结婚	6.62	244					
盖房	4.71	174					
流入地							
工作	1.73	64	担心外出找不到工作	6.65	2964	5.61	264
读书	1.68	62	其他	21.86	9739	56.71	2669
退休	1.46	54	总计	100.00	44542	100.00	4706
其他	29.06	1071					
总计	100.00	3687					

注:根据 2013、2018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整理。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样本占比较少的归入其他。

顾时,外出劳动力更倾向回流。因为回家结婚或与配偶团聚而回流的比例也较高,分别为 6.62% 和 5.53%。作为家庭关系的建立或纽带维系的方式,回家结婚、与配偶团聚都会使外出劳动力回流倾向增加。流出地经济因素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也较大,占 10% 以上;家乡就业机会的增加、务工收入的提高等会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两项占比分别为 6.37% 和 3.55%。家乡就业机会越多、务工收入越高,外出劳动力回流倾向越大。在流入地工作不满意或退休等也推动劳动力回流。

3. 影响劳动力未外出的原因

进一步分析未外出劳动力留守和回流劳动力留守的原因发现,流出地的非经济因素是劳动力留守的主要原因(见表 3)。在影响劳动力留守的原因中,流出地因素主要为年纪较大(27.05%)、照顾老人及子女(20.41%),其次是本地就业(11.32%),即当本地可以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时,劳动力倾向于留守。影响回流劳动力留守与未外出劳动力留守的原因大体相同,照顾老人及子女(16.47%)为回流劳动力留守主要原因,年纪大(10.65%)和身体原因(3.12%)也会促使回流劳动力留守。流入地的原因主要为劳动力担心在流入地找不到工作而留守,占比为 5.61%,比一直留守占比(6.65%)有所降低。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控制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讨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一) 基础回归

劳动力外出和再外出是流出地和流入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外出收入为拉动劳动力外出的流入地经济因素,即如果在家乡就业或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较低,而外出就业的收入较高,会促使劳动力选择外出的倾向增加,这在实证回归结果中得到了验证(见表4)。无论是劳动力首次外出还是回流后再外出,收入的影响较大,并且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系数大于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系数。其中,收入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系数为0.044;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系数为0.096。其次是流出地的经济因素,预期本地收入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系数大于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系数,有过外出经历的回流劳动力往往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本地找到工作的概率更大,影响系数往往较高。务农收入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系数大于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系数,从未外出的劳动力,在流出地从事农业生产或在本地就业,基本上未与农业生产完全割裂,与回流的劳动力相比,从未外出的劳动力与农业生产的联系更紧密,其系数相对更大。

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等作为流出地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劳动力流动。村规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村规的存在使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倾向更高,即村规、民约这种隐形的社会约束并不影响一直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流动,而回流劳动力可能适应流入地没有隐形约束的社会生态,回到流出地时,这种社会生态会推动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环境污染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中国劳动力流出地区,尤其是传统劳动力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发展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句话说,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非农产业较发达,就业机会较多,从未外出的劳动力更关注环境污染地区所具有的就业机会,回流劳动力由于适应了流入地的环境生态,回到流出地面对家乡的环境生态尤其是污染地区的环境生态,往往更倾向再外出。政府处理污染的态度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不显著,而政府如果积极治理环境污染,使回流劳动力再外出倾向降低,这与环境污染对劳动力首次外出和再外出影响不同的原因一致,从未外出的劳动力可能相对更关心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流出地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回流劳动力更在意流出地环境污染所形成的生存或宜居程度下降,因而政府治理污染的态度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不明显,但会降低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倾向。居民通常希望生活在政治生态良好的环境中,回归结果显示,村委财务收支越合理,劳动力首次外出和回流后再外出的倾向越低。因而,流出地与流入地在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差异促使回到流出地的劳动力心理成本不降反增而再外出。

个人禀赋中,男性劳动力更倾向外出。中国一直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表 4 劳动力外出与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 量	劳动力首次外出				回流劳动力再外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n 外出收入	0.0448*** (0.0067)	0.0405*** (0.0068)	0.0344*** (0.0069)	0.0439*** (0.0112)	0.1168*** (0.0174)	0.1214*** (0.0178)	0.0971*** (0.0176)	0.0956*** (0.0179)
ln 预期本地收入	-0.0546*** (0.0061)	-0.0553*** (0.0062)	-0.0349*** (0.0060)	-0.0193*** (0.0068)	-0.0784*** (0.0101)	-0.0609*** (0.0108)	-0.0212* (0.0116)	-0.0370*** (0.0134)
ln 务农收入	-0.0049*** (0.0013)	-0.0049*** (0.0013)	-0.0074*** (0.0014)	-0.0085*** (0.0015)	-0.0070*** (0.0021)	-0.0073*** (0.0021)	-0.0062*** (0.0021)	-0.0066*** (0.0022)
村规	0.0016 (0.0190)	0.0185 (0.0180)	0.0318 (0.0200)		0.0866** (0.0374)	0.0826** (0.0362)	0.1023*** (0.0394)	
环境污染程度	-0.0280*** (0.0074)	-0.0288*** (0.0072)	-0.0202*** (0.0075)		0.0341*** (0.0112)	0.0306*** (0.0113)	0.0211* (0.0120)	
政府处理污染态度	-0.0058 (0.0125)	-0.0037 (0.0120)	0.0076 (0.0124)		-0.0508*** (0.0140)	-0.0435*** (0.0135)	-0.0302** (0.0138)	
村委会财务合理程度	-0.0174** (0.0083)	-0.0181** (0.0080)	-0.0223*** (0.0084)		-0.0118 (0.0135)	-0.0231* (0.0132)	-0.0291** (0.0140)	
性别	0.0694*** (0.0109)	0.0604*** (0.0119)			0.1210*** (0.0185)	0.1175*** (0.0199)		
年龄	0.0211*** (0.0033)	0.0200*** (0.0034)			0.0151*** (0.0052)	0.0101* (0.0053)		
年龄平方	-0.0004*** (0.0000)	-0.0003*** (0.0000)			-0.0003*** (0.0001)	-0.0002*** (0.0001)		
婚姻状况	-0.0075 (0.0114)	0.0001 (0.0117)			0.0088 (0.0210)	0.0111 (0.0213)		
人力资本	0.0018 (0.0015)	0.0046*** (0.0016)			0.0009 (0.0023)	0.0005 (0.0024)		
健康状况	0.0020 (0.0070)	0.0073 (0.0073)			0.0404*** (0.0099)	0.0347*** (0.0103)		
ln 家庭固定资产	-0.0002 (0.0013)	0.0000 (0.0013)			-0.0083*** (0.0020)	-0.0089*** (0.0022)		
ln 金融资产	0.0009 (0.0011)	0.0015 (0.0012)			-0.0054*** (0.0019)	-0.0044** (0.0020)		
承包耕地	-0.0007 (0.0005)	-0.0003 (0.0003)			-0.0006* (0.0003)	-0.0005* (0.0003)		
劳动力禀赋	0.0457*** (0.0047)	0.0419*** (0.0048)			0.0600*** (0.0071)	0.0597*** (0.0074)		
观察值	6100	6100	6026	5524	3134	3134	3030	2874

注: 表中列出的是边际效应系数。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表中模型 1、模型 5 是只控制了外出收入、预期本地收入、务农收入的回归结果; 模型 2、模型 6 是加入了政治、社会及环境生态因素的回归结果; 模型 3、模型 7 是控制了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回归结果; 模型 4、模型 8 为控制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在农村外出打工也是以男性为主,留在农村的女性居多。年龄与劳动力首次外出和回流后再外出呈倒U形关系,年纪较小和年纪较大的劳动力外出倾向较低,主要是年纪较小的劳动力由于上学等原因,外出概率不大;而年纪较大的劳动力由于身体状况或退休等原因外出倾向较低。在家庭因素中,土地资源较丰裕的家庭,劳动力再外出的意愿较低。资本禀赋对首次外出的影响不显著,对回流劳动再外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即资本禀赋越丰裕的家庭其回流劳动力再外出意愿越低,尤其是农用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一定专用性,如果不投入农业生产,日常的折旧和摊销将演变为沉没成本,因而抑制劳动力外出。家庭劳动禀赋越高,劳动力外出倾向越高。

(二) 异质性分析

农业生产周期长、对自然禀赋的要求极高,且收益相对较低,这就使农村劳动力不得不通过跨部门、区域流动来提高家庭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多与子女教育有关(檀学文,2014),并且子女是否上学也影响劳动力回流,有近10%的劳动力将子女上学作为回乡的原因(Bai等,2003)。通常认为有干部背景的家庭比普通家庭能够获取更多可支配资源和市场信息,并且有干部背景的家庭与上层机构有更多联系,对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等更敏感。因而本文分是否有子女上学家庭、是否

表5 异质性分析

变 量	劳动力首次外出				回流劳动力再外出			
	有子女	无子女	干部	非干部	有子女	无子女	干部	非干部
	上学家庭	上学家庭	家庭	家庭	上学家庭	上学家庭	家庭	家庭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ln 外出收入	0.0629*** (0.0218)	0.0380*** (0.0131)	0.1012** (0.0435)	0.0402*** (0.0117)	0.1021*** (0.0197)	0.0740*** (0.0287)	0.1055* (0.0560)	0.0950*** (0.0189)
ln 预期本地收入	-0.0134 (0.0131)	-0.0102 (0.0082)	-0.0001 (0.0241)	-0.0225*** (0.0070)	-0.0383** (0.0185)	-0.0300 (0.0200)	0.0315 (0.0462)	-0.0392*** (0.0141)
ln 务农收入	-0.0183*** (0.0027)	-0.0048*** (0.0017)	-0.0045 (0.0052)	-0.0088*** (0.0015)	-0.0105*** (0.0029)	-0.0028 (0.0034)	0.0022 (0.0081)	-0.0068*** (0.0023)
村 规	-0.0358 (0.0430)	0.0535** (0.0225)	-0.0500 (0.0925)	0.0405** (0.0205)	0.0889* (0.0507)	0.1209** (0.0615)	0.2277* (0.1376)	0.1030** (0.0414)
环境污染程度	0.0016 (0.0145)	-0.0187** (0.0088)	0.0339 (0.0289)	-0.0248*** (0.0077)	0.0088 (0.0179)	0.0266 (0.0169)	-0.0239 (0.0421)	0.0167 (0.0127)
政府处理污染态度	-0.0008 (0.0228)	0.0074 (0.0147)	0.0182 (0.0423)	0.0090 (0.0131)	-0.0092 (0.0186)	-0.0456** (0.0211)	-0.1155** (0.0525)	-0.0301** (0.0144)
村委会财务合理程度	-0.0182 (0.0174)	-0.0262*** (0.0093)	0.0208 (0.0274)	-0.0173* (0.0096)	-0.0428** (0.0194)	-0.0144 (0.0209)	0.0915** (0.0398)	-0.0341** (0.0159)
观察值	1433	4087	491	4999	1531	1337	207	2638

注:表中列出是边际效应系数。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其他控制因素。*、**、***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为干部家庭讨论劳动力首次外出和再外出的异质性(见表 5)。

外出收入对劳动力首次外出和回流后再外出的影响，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系数更大，家庭有子女上学往往支出较高，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支撑，因而其系数相对较大。预期本地收入对首次外出家庭有无子女上学的影响不显著，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在有子女上学家庭影响显著为负。务农收入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中，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影响系数更大，而对于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中，对无子女上学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对劳动力首次外出的影响，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不显著，而村规民约的存在促进无子女上学家庭劳动力外出；环境污染越严重、村委会财务收支越合理，无子女上学家庭劳动力越不倾向外出；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中，村委会财务支出合理程度对有子女上学家庭的影响更显著，村规和政府处理污染态度对无子女上学家庭的影响更显著。

分干部和非干部家庭讨论中，外出收入作为流入地的经济因素对首次外出和再外出在干部家庭的影响系数更大，有干部背景家庭的劳动力，比普通农户获取更多可支配资源和市场信息，外出找到合适工作的概率较大，外出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在干部家庭中较大。预期本地收入和务农收入作为流出地的经济因素对非干部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干部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影响不显著，具有干部家庭背景的劳动力可能在本地就业的范围更广或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抱负，往往不太关心自己在家乡务农收入和本地就业收入的多少。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对干部家庭的首次外出影响不显著，对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影响，在干部家庭中影响系数更大，有干部家庭背景的劳动力对家乡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更敏感，当其适应流入地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时，其对家乡政治、社会和环境生态的不适应感更强。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通过改变回归方法和回归样本讨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OLS 和 Probit 回归方法对外出劳动力回流和回流农村劳动力再外出进行分析。另外，由于一些大城市本身经济较发达，以及地方政策等因素使大城市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因此，去除一线城市样本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本质性变化(见表 6)，说明本文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 进一步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发现，外出劳动力回流决策也是流出地和流入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 7)。如果外出收入达不到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同时预期本地收入和务农收入较高的情况下，外出劳动力倾向于回流。其中，流出地环境污染对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显著为正，污染越严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

表6 稳健性检验

变 量	OLS		Probit		去除大城市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劳动力	回流劳动力	劳动力	回流劳动力	劳动力	回流劳动力
首次外出	再外出	首次外出	再外出	首次外出	再外出	
ln 外出收入	0.0433*** (0.0112)	0.0877*** (0.0150)	0.0442*** (0.0110)	-0.0910*** (0.0100)	0.0417*** (0.0113)	0.1061*** (0.0173)
ln 预期本地收入	-0.0213*** (0.0070)	-0.0261** (0.0121)	-0.0199*** (0.0068)	0.0238*** (0.0063)	-0.0201*** (0.0069)	-0.0417*** (0.0135)
ln 务农收入	-0.0090*** (0.0015)	-0.0064*** (0.0023)	-0.0083*** (0.0014)	0.0104*** (0.0013)	-0.0088*** (0.0014)	-0.0065*** (0.0022)
村 规	0.0333* (0.0200)	0.0938** (0.0375)	0.0320 (0.0202)	-0.0209 (0.0187)	0.0338* (0.0202)	0.1026** (0.0399)
环境污染程度	-0.0208*** (0.0079)	0.0214* (0.0118)	-0.0212*** (0.0075)	0.0598*** (0.0059)	-0.0203*** (0.0075)	0.0216* (0.0121)
政府处理污染态度	0.0062 (0.0129)	-0.0308** (0.0140)	0.0080 (0.0122)	-0.0024 (0.0092)	0.0084 (0.0125)	-0.0321** (0.0139)
村委会财务合理程度	-0.0227*** (0.0086)	-0.0271* (0.0139)	-0.0221*** (0.0083)	0.0212*** (0.0076)	-0.0242*** (0.0084)	-0.0320** (0.0140)
观察值	5524	2892	5524	8363	5378	2841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模型 17、模型 18 为 OLS 回归结果,模型 19、模型 20 为 Probit 回归的边际效应结果,模型 21、模型 22 为去除大城市样本 Logit 回归的边际效应结果。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表7 外出劳动力回流的 Logit 回归结果(N=8363)

变 量	外出劳动力回流
ln 外出收入	-0.0948***(0.0102)
ln 预期本地收入	0.0227***(0.0062)
ln 务农收入	0.0103***(0.0013)
村 规	-0.0358(0.0430)
环境污染程度	0.0597***(0.0059)
政府处理污染态度	-0.0026(0.0092)
村委会财务合理程度	0.0212***(0.0075)

注:表中列出的为边际效应系数。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越合理越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村规对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不显著。

意愿越明显。对于流出地来说,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地区其非农产业越发达,就业机会相对越多,劳动力预期回到家乡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者获得满意薪酬的概率较大,因而其回流倾向越大。事实上,农户更希望生活在政治生态良好的环境中。实证结果显示,村委会财务收支合理程度对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乡政治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因而村委会财务收支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理论部分构建了劳动力流动方式选择模型,并利用 2013 和 2018 年上海财经

大学千村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再外出的动因,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明显的非稳态流动特征,特别是近10年来,这种非稳态流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即流出与回流及回流与再外出的频度提高,流动的地理半径缩短。这种反复流动对于平衡区域劳动力供需、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村家庭收入结构等会产生深刻的影响。(2)收入是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结婚和与配偶团聚等问题则是“拉动”部分劳动力回流的主要非经济因素,回流劳动力再外出除了由于熟悉了流入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回到流出地反而对家乡的社会、政治及环境生态产生不适应感的心理成本变化外,农业经营收入的相对低稳定性也是回流劳动力再外出的主导力量。(3)个人禀赋、家庭因素等会影响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土地资源和资本禀赋较富裕的家庭,劳动力再外出的意愿较低,劳动禀赋较富裕的家庭,外出的倾向更高。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占总就业人数的37.2%,因此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显得更加重要,尤其是这部分劳动力的反复、无序流动如果频繁发生,将可能造成一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区域劳动供需失衡、农村家庭收入提高受阻等。因此,要使农村劳动力合理、畅通、有序稳态流动,可以考虑在以下政策方面加以调整和完善:(1)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流出地地方政府应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方面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提高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避免由于与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差太大,造成回流劳动力的反复外出。(2)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应的人才政策,用好回流的人力资本。回流劳动力大多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并且拥有外出工作经历而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物资积累,包括在外出就业积累的技术、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储蓄等,而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就业环境和市场不同,可能使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得不到发挥,且不能获得合理的报酬,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和回流劳动力继续外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制定适当的人才培训计划和引进政策,使回流的人力资本可以因地制宜地、尽可能地发挥最大效用,积极引导回流资金参与地方经济发展或乡村振兴发展。(3)激发流出地的后发优势。未来地区间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资源的竞争有可能会加剧,对传统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地区,一方面要顺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释放乡村存量劳动力以降低一部分城镇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大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度,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从而维持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趋势,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劳动力要素的最优配置。地方政府在积极引导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盲目引进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或项目往往会造成回流劳动力“用脚投票”。

参考文献：

1. 常进雄、赵海涛(2015):《农民工二次跨区流动的特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 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第2期。
3. 郭犹焕(1995):《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4. 檀学文(2014):《为什么多数农民工子女留守而不流动》,《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5. 王超恩等(2013):《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6. 王红玲(1998):《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4期。
7. 王子成、赵忠(2013):《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管理世界》,第1期。
8. 吴方卫、康姣姣(2019):《农民工流向选择和区域流动变化研究——基于河南省农民工流向的经验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12期。
9. 杨志明(2017):《中国特色农民工发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10. 杨振宇、张程(2017):《东迁、自选择与劳动力溢价:“孔雀东南飞”背后的故事》,《经济学(季刊)》,第4期。
11. 周传豹等(2016):《收支余额变动与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跨区域回流趋势》,《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
12. 佐藤宏、李实(2008):《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成分、家庭文化和教育》,《经济学(季刊)》,第4期。
13. Bai N., He Y. (2003),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ities: 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4(4):149–159.
14. Bhandari P., Ghimire D. (2016), Rural Agricultur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Out-migration. *Rural Sociology*. 81(4):572–600.
15. Boski P. (2013), A Psychology of Economic Migr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7):1067–1093.
16. Durand J., Massey D. (2019), Evolution of the Mexico-U.S. Migration System: Insights from the 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4(1):21–42.
17. Emerick K. (2018),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the Sectoral Reallocation of Labor in Rural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5(c):488–503.
18. Gabszewicz J., Tarola O., Zanaj S. (2016), Migration Wages and Income Taxes.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3(3):434–453.
19. Massey D.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1372–1403.
20. Olesen H. (2010), Migration, Return, and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5):125–150.
21. Su Yaqin, Tesfazion Petros, Zhao Zhong (2018), Where are the Migrants From? Inter-vs. intra-provincial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47:142–155.
22. Ward Z. (2016), Birds of Passage: Return Migration, Self-selection and Immigration Quota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4:37–52.

(责任编辑:朱 犀)